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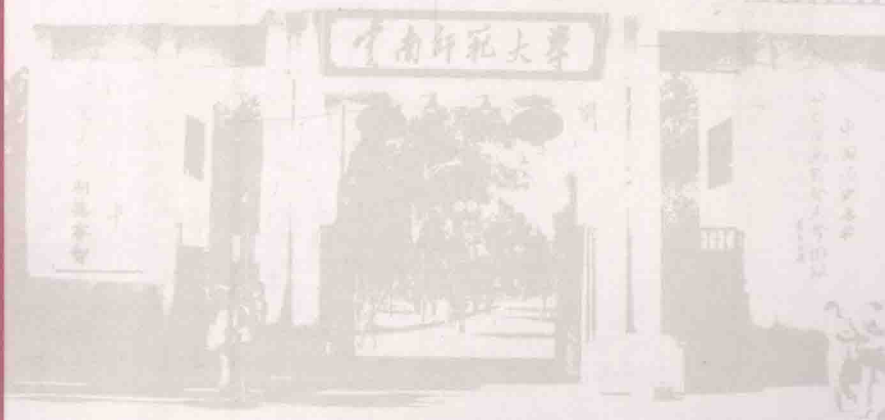
联大文学文库

流派论争

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

冯小禄 张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流派论争

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

冯小禄 张欢◎著



—联大—
—学—
—术—
—文—
—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派论争: 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 / 冯小禄, 张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588 - 2

I. ①流… II. ①冯…②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明代
IV. ①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4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张 瀚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25

插 页 2

字 数 477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奉读小禄新作，想起一件往事。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期间，某日得到系里通知，黄药眠先生将于 1979 年 12 月 1 日下午为我们讲授明代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请大家预习此文。同学们始则兴奋，继则惶惑。以先生之大名，应该讲些在当时高深而前卫的理论问题，一篇白话小说，早已耳熟能详，能有什么微言大义呢。带着疑惑，我们到教室恭候。

先生来了，从口袋里掏出纸烟盒大小的纸片开宗明义：通过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讲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讲怎样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当时的先生，身体已不是太好，思路却异常清晰。先生说，小说的背景，是在宋代南渡以后。当时的南方，城市经济有所发展，商人、工匠在社会生活中渐有地位，在文学作品中有更大的影响，话本小说乃成为市民文学的主要形式。此前的唐人传奇，主角多为落魄文人，话本的主人公则大多是商人、工匠、伙计，即士大夫所谓的市井之徒。《卖油郎独占花魁》属明人拟话本，而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更甚于宋代。接着，先生分别就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和一个情节，剖析主人公秦重的行为、心理特征，以进一步分析当时社会潜在的新因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一个细节是，小店员秦重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一见美娘，即心生爱慕。为筹划见美娘需要的十两银子，“一路上胡思乱想，自言自语”。他设想“从明日为始，逐日将本钱扣除，余下的钱积攒上去。一日积得一分，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只消三年，这事便成了。若一日积得二分，只消得半年。若积得再多些，一年也差不多了”。秦重果然按此规划去作，“时光迅速，不觉一年有余。日大日小，只拣足色细丝，或积三分，

或积二分，再少也积下一分。凑得几钱，又打做大包块。日积月累，有了一大包银子，零星凑积，连自己也不识多少”。先生说，小说对秦重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作的细致描写，活画出小生产者一钱如命的特点，这也是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行为习惯和心理特征。巴尔扎克笔下的葛郎台，与此应有相似之处。

一个情节是，秦重攒足银子去见美娘，之前却有一番犹豫：“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我卖油的纵有了银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清清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最终秦重去了，不但见到美娘，还以自己的诚厚换得了美娘的芳心。对此，黄先生又有如下分析：“一、像美娘这种花魁娘子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卖油郎即使有钱，也无法问津。但从当时妓院的规定来看，只认钱，不认人，这就反映出了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现象。打破了贵族制定的等级界限，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抬头的。二、秦重虽然有钱壮胆，但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美娘不相称，怕受到侮辱和拒绝。他的心情是胆怯的，这说明当时城市的市民虽然抬头，但尚未从旧习惯、旧思想中解放出来，还心有余悸。三、美娘从豪华宴席中回来，见秦重畏畏缩缩，瞧他不起，一连喝了几大盅以示拒绝。不料秦重反倒伺候她，甚至让她的呕吐物装进自己的衣袖，且并无占有她的意思。美娘因此受到感动，后来还倾心于他。秦重既无堂堂仪表，又无显赫地位，何以引得美娘倾心？这是因为美娘向往一个能平等待她，能够真正寄托终身的人，这在王孙公子那里不可能找到。美娘要求平等的愿望，是资产阶级以平等思想对抗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

对于秦重的自卑心理，黄先生还有如下分析：“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如此胆小？原因是欧洲的封建制度与中国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欧洲贵族多居于城堡，商人多居于城市。有些地方，如古希腊，一个城市带上周围的领地，便是一个国家。商人有军队，甚至可组成联盟对抗封建诸侯。他们的商队四处经商，有自己的武装保护。所以，在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商人有半独立的性质。中国则不同，中央集权制度下，行政、军事、经济大都集中在城市，商人受到严重的压抑。大的工厂多是官办，私营的很少。商人运商品到远处去卖，主要依靠官府保护，即有自己的保镖，实力毕竟弱小。正因如此，中国的市民和市民文学，表现出一

种强烈的自卑感。”（以上引文均出自本人当时的课堂笔记）

一篇白话小说，被黄先生以小见大，分析得如此深刻，对我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我们正当读研的第三学期，根据教学计划，老师们的授课集中在明清文学。公安三袁是我当时自选的阅读重点，我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文学现象，正有进一步探究的浓厚兴趣。先生从小说讲到古代市民的自卑与软弱的历史原因，使我想起袁宏道在《答沈伯函》中感慨的“荆商之困极矣”！袁宏道回忆少年时所见沙市，工商业异常繁荣：“嚣虚如沸，诸大商巨贾，鲜衣怒马，往来平康间，金钱如丘，绫锦如苇。”然而“不数年中，居民耗损，市肆寂寥。居者转而南亩，商者化为游客，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原因在于“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① 中官代表皇权对新兴市民阶层和民间工商业的茶毒，目的似乎不仅在经济的掠夺，其中还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与仇视。中国封建集权社会构建于小农经济的土壤，尤以农民的“安土重迁”为其统治基础，故对以流通性为基本特点的商业活动持戒备的心态，“重农抑商”乃成为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明代江南工商业的发达，必然令皇权及其维护者心戒惧。兼以皇朝的腐朽与贪婪，中央政府乃利用宦官，巧立名目，以采办、征办、商税、矿税、建祠等名义，对江南进行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横征暴敛之下，工商业凋敝，自然会激起市民的不满与反抗。《明史·陈奉传》载：“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征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陈）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嘈于途，竟掷瓦石击之，奉走免。”张溥《五人墓碑记》也记录了市民与东林党人共同抗击中官缇骑，倘无后者对市民权益的无止境剥夺，这样的“结盟”岂能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市民阶层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一方面造就了其自卑与软弱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启发出了新的价值观念，并使市民阶层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正是因为社会有了这样的变化，宋明白话小说才有了新气象，也才产生了像秦重这样的人物。尤其在明代，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既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与人际关系，也影响了文人与文人文学。袁宏道强作吴令，身心疲惫痛苦。他在

①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

与丘长孺书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①袁宏道对官场人际关系的写生与批判，与正始名士之揶揄官场已有不同的意义。嵇康“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阮籍固然放达任诞，却不愿儿子阮咸步自己后尘（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原因即在于嵇、阮并非不看重名教，而只是借此表达自己对曹氏衰渎名教的不满。而袁宏道的“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则已直指封建官场与封建礼教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则更生动地呈现出他在这种折辱人格的依附关系中的痛苦与挣扎。在如此认识与心态的支配下，袁宏道们在浸淫于传统人生与文学的价值取向的同时，还竭力倡导以文学体认自我的“独抒性灵”，从而赋予明代中叶文学以新的特点。

听了黄先生的讲课，深受启发，也给了我信心。我花了足足一个学期的时间，围绕公安三袁，读李贽、徐渭等相关人物的著作与事迹，编撰了《明代中叶文学思潮》的资料长编，希望以此为发端，继续探讨明代社会经济的新因素对文人以及文学产生的影响。启功先生为鼓励我，还预先为我题写了书签。遗憾的是，后来我的兴趣发生转移，去做古奥典雅的汉赋，辜负了先生的厚望，而耗费过自己心血的资料长编至今仍蒙尘高阁。

有幸的是，或许是缘分使然，小禄从我攻读硕士，从启功先生攻读博士，我们虽然从未向他提起这一课题，他却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并坚持不懈，做得非常的精彩。以出版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他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现在又推出了新著《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他借鉴法国人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视明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流派论争为一活泼互动的“文学场”，而此场域又与为其生存背景的明代经济、政治与文化所构型的场域同构。我认为正是有后者与前者提供生存的大背景，而且有前者与后者之间的互动，作者才能把明代文学论争的深刻性、复杂性、尖锐性揭示得淋漓尽致。

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强烈精彩的问题意识。明代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众多，它们之间

^①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

的关系异常紧张，对立论争十分激烈，这些都写进了诸如“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常识”，但作者为什么还要花三十七八万言来阐释分析这个“常识”？是没做好调查工作？当然不是，小禄的博士论文早就指出在明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研究中，存在着研究价值确定的单元化和理论研究的静态化倾向，论者往往只强调文学流派之间紧张对立的一面，却忽略它们之间相互启发和补充的另一面，这就不仅遮蔽了文学发展的动力和文学流派关系的真相，还因此遮蔽了明代文人的真风貌和真精神。作者要做的工作，是在多维论争的场域中去“还原”，还原为多数学者所贬抑和忽视的明代文学集团与流派的生存发展变化面貌和本质，“‘还’个人、流派、集团的本来面目和精神光焰”。^①

但这项研究工作实在庞大而复杂，非一朝一夕可以奏功，故作者又于2008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看来只是在博士论文的题目上加进了“流派”一词，但研究的视野、内容和方法都有大幅度的深入和拓宽，完全是一部具有强烈而精彩的问题意识的明代文学流派研究新著。其视野更为宏阔，前及元末明初，后迄明末清初，立足文学而辐射政治、哲学和道德领域；内容更加丰厚，思考也更为透彻，深入到文学流派的生存策略和演化机制，深入到文学流派与八股文风尚的密切关系；方法也更加灵活，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三观”并用，呈现出一幅广揽博收、五光十色的明代文学流派生存与演化图景。它令读者从中看到了多样形式、多维态势和多种性质的流派论争之于明代文学生存与演化的重要作用，如作者所言，是“生存根基”，是“演化场域”。

二、突破“瓶颈”的研究意义。明代文学研究，自“五四”以来，基本都集中在被视为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上，而诗文则由于其独创性减弱、陷入与唐诗宋文相仿等缘故，受到人们的批评乃至否定。对因诗文而起的各种流派论争，就更加不被重视了。且不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古人和以梁启超、闻一多为代表的近现代人对明代文人论争的不满和不屑，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明代诗文研究，也对明代文人论争的正面、深远学术意义视而不见。可以说，对明代文人论争的认识和评价进入了一个艰难的“瓶颈期”。对此，作者截断众流，从正面突破，从根

①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引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底做起，以“香象渡河”的精神气魄，去催新研究的思维和格局。于是，作者从具有由古代迈向近代的巨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明代文化出发，认真踏勘，充分估量了明代文人论争所表现的时代文化征候和通向近现代的文人气质。也就是如作者所保守断定的“潜近代”性质：“‘五四’以来历史学界对明代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持续讨论，文学界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明文学的‘隔代联姻’，以及中晚明文坛处处弥漫的繁荣腐烂和明代文人论争时的狂暴简截作风，都无不在提醒我们明代文学包括此处所论的文学流派论争，确实有着可以超越其封建专制时代古典文学阈限，而与近现代文学流派论争状况作对比学术联想的地方。”（见本书《结语》）

围绕上述学术判断，作者从“诗文统系和取法争论”、“主流文学流派的演化”、“主流文学流派和地域文学流派的关系”和“文学流派的时文根基和古文、时文之争”等四大论题，不仅准确地描述、分析了明代前期“渐趋紧张”的文学流派争论气氛，指出了一系列政治文艺斗争下的诗文统系和宗法争论，而且解剖了纷纭复杂、乱象横生的中晚明文学流派论争的多维思想态势和多种论争因素。读者借此可以了解，流派论争确实是明代文学集团的生存根基和演化场域；明代文学不再是主流文学流派之间简单的、直线式的不断向前更迭，而是有了它盛衰演化的文学思想机制、社会群体心理机制，以及多方对立、相互潜伏的文学流派对峙与融合关系。由于作者阐明了作为“场域”、“论坛”的文学流派论争之于明代诗文研究的新的学术意义，让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旧话题，因为新的学术眼光的烛照与研究内容的投入，有了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盖“场域”者，近于今人所说的“对话”“交往”理论，可以提供鲜活灵动的文学思想气息和文学演变图景。我认为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三、新论域的开辟和新观点的迭出。仔细阅读本书，会有一种“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的观感，新内容、新论题络绎不绝而至。

比如，针对政治道德气氛十分浓重、文学论争并不显著的明前期，本书采取了与之相宜的讨论主题和讨论方式，一方面抓住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看其潜在的诗文统系和宗法争论；另一方面抓住时代的文化特征，或从总体论述一个时期的论争特点，或从政治冲突事件入手，分析其所折射的文艺思想冲突。前者表现在对景泰到弘治时期诗学多歧状况的梳理，指出由于理学的盛行，高扬宋诗的论调很是流行，以致需要为唐诗的

宗法地位进行辩护，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明代的唐宋诗之争认识，补足其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后者表现在对元末明初文学流派论争特点的四个方面的归结，对聂大年与王直之争和“翰林四谏”等事件的深入分析，即较好地解释了明初文学集团、流派虽多，却无“门户流波”的时代气氛，以及文学政治化声音越来越强烈的时代特征。

针对中晚明文学流派论争激烈的特点，作者则注意呈现其对立论争之外的多维态势和复杂格局。在这方面本书的表现相当突出，用“主流文学流派的演化”和“主流文学流派和地域文学流派的关系”两个大的论题范围来总括提示，又用六章的篇幅来具体讨论。并且很多章节的问题设计颇见新意，具有展示文学史变迁的多种动力因素的自觉意识。比如下面这些观点即十分重要，很有启发性：前七子派与茶陵派的破裂实质是文权之争，体现出明代文权下移的历史性趋势；围绕徐祯卿的生前身后之争，映射出北学与南学、心学与文学的复杂对立和融合情形；后七子派的四面出击和四面受攻，体现了它最鲜明的文学流派性质和对文学独立的追求，是最具文人集团气质的文学流派；晚明地域流派的争盟意识、地域文化建构，解释了文学流派生存转换的文学主张策略和失去领袖的群体从众心理机制，等等。

而新论域的开辟，我以为当数作者对明代文学流派的时文根基和古文、时文之争的讨论了。时文，即人们常说的“八股文”，在明清文人的生活 and 生命中意义非凡。鄙夷辱骂也罢，羡慕赞扬也罢，明清文人和还未废除科举的清末民初人都与之脱不了干系。以前，启功先生曾有感于时人不懂“八股”为何物，却竞相冠以“谑谥”“恶谥”，故作《说八股》一文以明其本来面目，详述其名称、体制和源流，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在跋语中，先生深情回顾了陈援庵先生对他的教益，说：“科举未废之时，举业既属士子唯一出路，八股文自为必读必习之艺。”^①对此，本书将先生的议论推进到论八股文与中晚明文学流派的关系，可说是先生大雅之言的一种薪火相传，我心也感欣慰。本书通过细密的材料收集，从官方记录反映等三个方面，指出七子派的秦汉文宗法已经进入时文的写作轨道，这就丰富和推进了学界对古文作风和时文风尚关系的探讨。而对公安派一系列的科举时文意见和文学流派主张的若合符契的深度揭示，则可以让学界进一

① 《说八股》，《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

步认识到时文与文学流派的紧密关系，确实已到了作者所指出的“根基”性质和与诗赋、古文“表里纠结”的程度。这是对文学流派主张与八股文关系的一次大胆而深入的讨论，可以引发一个崭新的论域。

总之，本书第一次比较宏大而客观深入地展示了明代诗文集团和流派论争的广泛激烈过程和广阔内容，揭示了文学流派盛衰转换的文学思想和社会心理机制，阐述了论争所映射的政治、思想诉求和文人生存境况、文学理论批评的进展。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是一部具有丰富深刻内涵和多个研究层次的明代文学流派论争史。同时，也是第一次，本书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不同群体尤其是著名诗文流派的科举时文意见，深入揭示了前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流派宗法策略与时文的表里相应并深入融合的特点。这对纠正人们对于文学流派论争和八股文的蔑视态度，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是为序。

万光治

2013年9月20日于成都

序 二

几年前，阅读冯小禄博士所修订出版的博士论文《明代诗文论争研究》，就清晰地感受到一股青春的锐气逸出笔端，敲击着读者的心灵。全书除了“引论”与“余论”以外，分为“文学政治时代”“文学复古时代”“文学师心时代”三编，共十九章，涉及十九个专题，讨论有明一代最为重要的一些诗文论争现象，资料丰富，论述深入，行文矫捷，文笔老辣，让人爱不释手。可惜的是，由于篇幅有限，许多见解未能充分展开论述，又不免令人感到意犹未尽。

时隔七年，冯小禄博士再次为学术界奉献一部煌煌大作——《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全书近四十万字，在前一部著作的基础上，另起炉灶，从“诗文论争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流派论争研究”领域挺进。初读该书，便令我顿生欣喜之感。同前一部著作以时代统辖专题研究的写作结构不同，这部新作采用的是以四大论争范围组合成编的结构方式。这四大论争范围包括“诗文统系与取法争论”“主流文学流派的盛衰演化”“地域文学流派和全国主流文学流派的竞争”“中晚明文学流派的时文根基和古文、时文之争”。冯小禄博士选取这四大论争范围，不仅恰如其分地囊括了明代诗文流派论争的重要内容，而且别具慧眼地揭示了明代诗文流派论争的时代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从而成为“文学流派论争研究”的成功探索。

从该书的整体内容来看，第一编、第二编大致上仍然采用以时代统辖专题研究的论述结构，写作内容与前一部著作略有重合交叉之处。第一编论述明初的浙东文派，明前期的台阁派、茶陵派、吴中派；第二编讨论正德、嘉靖时期的前七子派、六朝派、初唐派、中唐派、理学派、唐宋派、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这些流派的文学论争现象及其特色在前一部

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有的还做了相当精彩的论述（例如对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等的讨论）。但是，旧的论题一旦进入新的论述框架，在题旨发掘、材料取舍、意义辨析、论述展开等方面，却都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变化。关于这一点，只要对读新著第二编第三章“晚明楚地三风的竞争及对三风的批判维护”与旧著下编第二章“三方论坛——公安派、竟陵派与后七子派的论争”，我们就不难看出，新著不仅材料更为丰富，层次更为清晰，内容更为深广，更重要的是，同旧著相比较，新著自觉地突出“流派论争”这一主旨，细致地描述了流派论争的演化过程和对峙态势，深刻地揭示了文学流派以论争求发展的生存策略和文化姿态，从而具有更为鲜明的理论思辨色彩（作者按：由于字数原因，本书的最终定稿还是删除了这一章，但保留郭老师的序言原文）。同时，在第一编、第二编中，冯小禄博士还特别指出“明初诗歌流派的组织性和盟主意识”、“明初文学流派的论争特点”、“诗学多歧：明前期不同流派的唐宋元诗取法论”、“初构明代文学正宗谱系：钱、黄、王的诗文流派批评”等颇富学术价值的研究专题，对“流派论争”进行了更为宏观的理论思考，从而实现了对前一部著作的整体性超越。

该书的第三编和第四编，更为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后出转精”的整体性超越。这两编不仅众多论题较前著焕然一新，而且这些全新的论题，在迄今为止的明代文学研究中，也以其新颖性、独创性、深刻性而独具风标。这些论题主要围绕着“地域文学流派和全国主流文学流派的竞争”“中晚明文学流派的时文根基和古文、时文之争”两个方面展开，其中对北学与南学、心学与文学、时文与古文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思考，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推进，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该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明中期和明后期一些重要诗文流派的科举心态、时文观念和古文观念，深入揭示诗文流派的宗法策略与时文表里相应并深入融合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例如该书认为，前后七子派倡导的秦汉文宗尚，已经步入时文写作的轨道；时文与古文、诗文流派的表里纠结和深度融合，证明主流文学流派思想风行程度与时文风尚变化的密切关系，这在提倡新变和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不是自觉地着眼于明代诗文流派论争的时代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如果不是对明代诗文流派论争文献有着丰富的把握，对明代诗文流派论争现象有着透彻的思考，冯小禄博士是不可能提出并解决这些新颖、独创而

深刻的论题的。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冯小禄博士的理论探索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持续的，譬如剥笋，层层深入。在全书的“结语”部分，他用两万多字的篇幅，深入讨论在文学史研究中揭示文学流派论争的五个重要意义和作用，亦即揭示文学流派论争对于明代文人生存状况和终极人生价值的安顿意义，对于文学流派的审美思想策略选择和盛衰演化机制的意义，对于拓展文学批评空间、健全批评姿态和催生文学理论的作用，对于探求政治格局、学术思潮和个人重心转移的重要作用，对于展拓文学流派与科举时文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五个重要意义和作用，原本就是该书贯穿始终的五条主线，是作者书写策略的五个主要方面，同时也是该书学术价值的五个主要方面。换句话说，该书在明代文人生活和心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及其演进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与文人思想研究、明代科举时文研究等领域，都较前人有着更新、更深、更广的掘进。

根据冯小禄博士的考察，同明前期文人相比较，以后七子派、公安派等为代表的明中后期文人具有极为浓厚的文士习气，他们对于以文学成名不朽有着终身以之的精神追求，而诗文写作和流派论争正是实现他们人生终极价值安顿的必要方式，对他们而言，“进入文学史”具有重要的精神生存意义和终极意义。袁宏道说：“诗文是吾辈一件正事，去此无可度日者。”（《袁宏道集笺校》卷43《答黄平倩》）钟惺对此表示首肯，说：“袁石公有言：‘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此语与余颇同。昔人有问长生诀者，曰：‘只是断炊。’其人摇头曰：‘如此虽寿，千岁何益？’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隐秀轩集》卷35《自题诗后》）冯小禄博士对明中后期文人的这种精神追求多加许可，我想，在当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里，他应该是以此自励，自觉地以文学学术研究与著述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精神皈依之地，乐在其中。这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我愿以此与作者共勉。有理想烛照的人生应该是更为美好的人生。

是为序。

郭英德

2013年9月16日草于北京京师园寓所

目 录

绪论	(1)
一 立论依据	(2)
二 明代文学的“潜近代性”	(7)
三 本书的主要特点和意义	(12)

第一编 诗文统系与取法争论

第一章 “无门户流波”:元末明初的诗文流派论争	(19)
第一节 浙东文派的古文统系建设和论争	(20)
一 “含文于道”:浙东文派的文统建设与批判	(21)
二 “图大略小”:浙东文派的文法建设与批判	(24)
三 “化今传后”:方孝孺与王绅的论争	(27)
第二节 明初诗歌流派的组织性和盟主意识	(30)
第三节 明初文学流派的论争特点	(42)
第二章 台阁派统制:永乐到正统的诗文流派论争	(49)
第一节 “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52)
一 台阁派古文统系的儒学政治性	(52)
二 台阁派作家的崇盛唐诗观	(55)
三 “不激不随”:台阁派的盟主策略和论争特点	(58)
第二节 台阁派统制下的文学流派论争	(62)
一 “二洪”之争	(62)
二 聂大年与王直之争	(65)

第三章 渐趋紧张:景泰到弘治的诗文流派论争	(68)
第一节 台阁派内部的政治、文艺斗争:“翰林四谏”事件分析	(71)
第二节 台阁与山林的多种论争态势	(79)
一 茶陵派与陈庄体、沈周	(79)
二 桑悦斥言台阁文学观念	(83)
三 丘濬与庄昶的冲突	(86)
第三节 诗学多歧:明前期不同流派的唐宋元诗取法论	(90)
一 理学盛行背景下的高扬宋诗论	(91)
二 飘摇的护唐诗论	(97)

第二编 主流文学流派的盛衰演化

第一章 “世之矜持门户多矣”:茶陵、前七子派与理学、唐宋派	(111)
第一节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111)
一 “文权下移”说的提出	(113)
二 为文权而分裂的两派关系指实	(116)
三 茶陵派的文学虚应	(120)
第二节 由秦汉到唐宋:政教理学派和唐宋派一系的古文批判	(123)
一 政教理学派对秦汉宗法和王学末流的并置批判	(123)
二 唐宋派一系对前后七子派的秦汉文风批判	(128)
第二章 心灵调适和宗法位移:由前七子到六朝、初唐、中唐三派	(137)
第一节 坚持还是变通:前七子派系的诗歌取法实践及争论	(139)
一 前七子派余脉的新变及争论	(141)
二 坚守前七子派宗法立场及争论	(144)
第二节 六朝·初唐·中唐:新派的诗法及争论	(149)
一 六朝派的诗法及争论	(151)
二 初唐派的诗法及争论	(155)
三 中唐派的诗法及争论	(159)

第三章 四面出击:后七子派的内外之争和集体文学追求	(165)
第一节 后七子派与唐宋派的论争	(166)
第二节 后七子派对嘉靖前期各新旧诗派的批判	(171)
一 对吴中多变诗风的批判	(173)
二 对性气诗派的批判	(179)
三 对王维桢等前七子派余脉的批判	(183)
第三节 后七子派的集体文学追求和内部争论	(185)
一 后七子派的集体文学追求	(186)
二 盟主·座次·诗统:后七子派的内部争论	(192)
第四章 初构明代文学正宗谱系:钱、黄、王的诗文流派批评	(199)
第一节 钱谦益构筑的明诗流派正统和伪体谱系	(201)
一 “挽回大雅还谁事?嗤点前贤岂我曹?”	(202)
二 《列朝诗集》的诗派谱系	(203)
第二节 黄宗羲的明代古文统系构筑和古文流派批评	(211)
一 全国和浙东的明代古文“正宗”“邪宗”谱系建设	(212)
二 指向末流:对唐宋派和七子派的批判	(221)
第三节 王夫之的文学流派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	(225)
一 《姜斋诗话》对文学流派建立和习气的批评	(226)
二 《明诗评选》的“霸统”“魔诗”批判	(230)

第三编 地域文学流派和全国主流文学流派的竞争

第一章 北学与南学、心学与文学:明中期吴中派的思想态势	(245)
第一节 南学向北学的趋近与融合:李梦阳和徐祯卿之争	(246)
第二节 北学和心学评价的南方回响:徐祯卿的身后之争	(248)
一 北学评价的南方回响	(249)
二 心学评价的南方回响	(255)
第三节 与北学的对峙和呼应:“伊余守初质”的吴中诗文 理论	(259)